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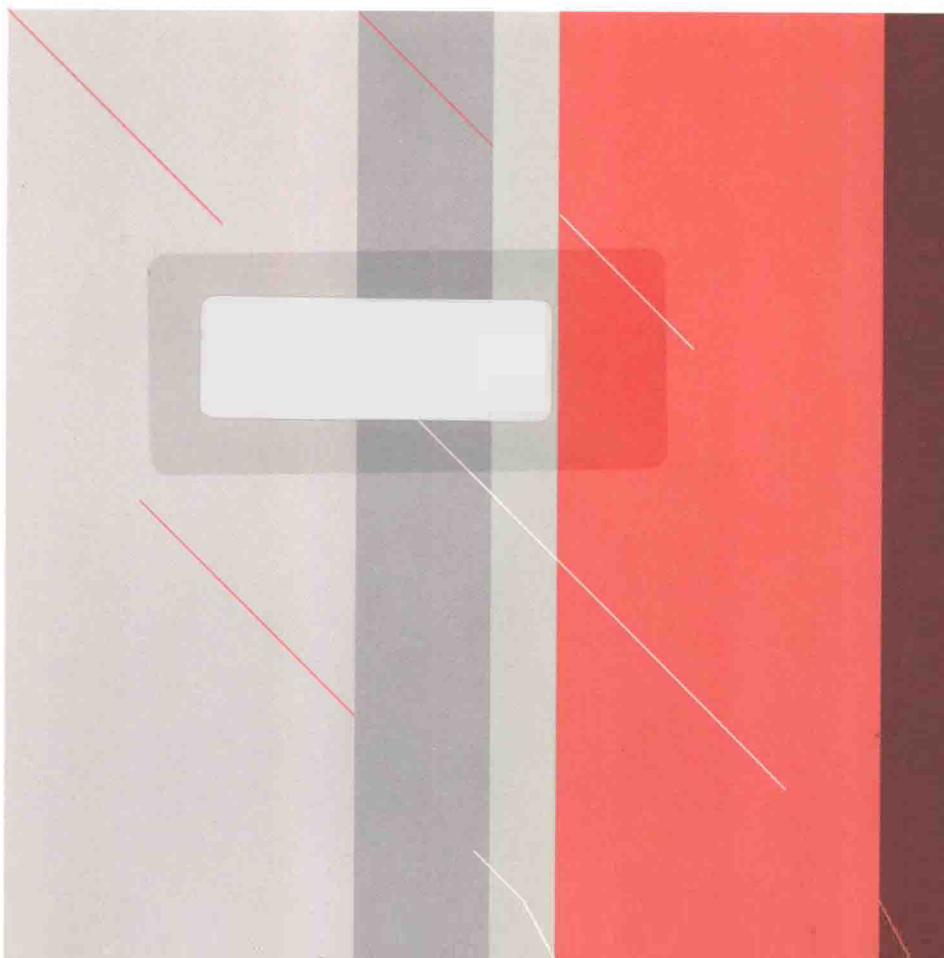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蓬瀛道教音乐研究基金资助
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丛书

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

东北卷

萧梅 主编



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

东北卷

萧梅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东北卷/萧梅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 - 7 - 5039 - 5482 - 5

I. ①中… II. ①萧… III. ①传统音乐—民间音乐—
研究—东北地区 IV. ①J60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0331 号

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东北卷

主 编 萧 梅

责任编辑 王 红 潘 艳

封面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信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9

字 数 3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482 - 5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前 言

萧 梅

本卷是“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的东北卷。

以区域性的地方卷本展开“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以下简称“计划”）^①，始于1999年秋季。作为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联合策划和统筹、对民间信仰体系之仪式音乐传统进行全方位研究的“中国民间信仰仪式音乐的曲目、风格及传统研究”计划的第二阶段^②，它依然秉持了项目主持人曹本冶教授在第一阶段便为其定位的“对一些保存较完整的民间信仰体系之仪式音乐传统进行田野考查，记录完整仪式的现场录音、录像及摄影，并搜集有关的文字及口述资料；将这些仪式音乐传统整理汇编，包括仪式音乐在信仰体系内的运用场合、功能、习惯、曲目、传承和传播方式、乐师与仪式人员等；从仪式音乐的生态环境切入其信仰体系和社会文化，分析研究仪式音乐与信仰体系、仪式演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辨别出其地域性的音乐文化特征及跨地域性元素”的理念。经过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域涉及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及新疆的15个研究课题作业，最终于2004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西南卷和西北卷（作为地区卷本的第一单元）。其后，曹本冶教授继续

^① 该计划始于1993年。此前进行了“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主要道教官观传统仪式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较研究”等系列项目。

^② 其第一阶段，应为曹本冶教授及其学生们在河北省农村对“音乐会”进行的研究。参见《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北卷》的“前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计划”在华南和华东地区执行，并于2007年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东卷（上、下）及华南卷（上、下）。

2007年底，曹本冶教授担任了上海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主任。在“中心”的理论研究系列项目中，他继续展开了“仪式音乐的地域性和跨地域性、传统与变迁的个案和宏观比较研究”。其间，在本领域同仁的建议下，“中心”于2011年出版了《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北、西南、华东增补合卷》；2012年又出版了《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中卷》。再加上以东北卷冠名的本卷，则延续之“计划”卷本，基本上覆盖了中国大陆的各大区域。

与“华中卷”论域集中于兼容“儒释道”三教之功能与特色并与本土道教文化有着深度渊源关系的民间宗教信仰层面相仿，“东北卷”的论域亦集中于一个主题——东北少数民族萨满音乐文化，因此，又可称之为“萨满音乐文化专卷”。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心”近年来的课题计划，在地域的视野中又有专题的聚焦，它们本身是具有地域特点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在地域性及跨地域性的研究方面，尚留有极大的探究空间。

东北地区的黑龙江、辽河和鸭绿江流域，是中国萨满文化的三大重点区域。作为萨满音乐文化专卷，本书主要收录了刘桂腾、杨玉成、红梅、高贺杰、王晓东、吕晓东、文慧的8篇研究论文。在编辑上，原来考虑为上下篇结构。上篇为以个案研究为主的6篇文论构成，下篇则单列为刘桂腾的“东北少数民族萨满音乐”专题。鉴于后者在写作上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刘桂腾在长期的萨满音乐研究中，对东北萨满文化及其音乐的总体研究；第二部分是他对东北少数民族萨满鼓的专题研究。其第一个部分，除了以丰富的资料为我们勾勒出东北少数民族萨满音乐文化深远的历史脉络，亦以流域等地域特色作为阿尔泰语系两大语族萨满音乐文化的叙事框架，有机地呈现了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满族、赫哲族、锡伯族以及蒙古语族的蒙古族、达斡尔族诸民族以萨满文化为联系的“东北诸民族相互之间存在共同族源，历史上的分分合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些族群普遍具有以‘万物有灵观’为哲学基础的萨满信仰，成为东北少数民族民族发展史中的精神家园”的图景。其第二部分则以萨满鼓为主轴，专题性地论述了萨满乐器

的研究。作为编者，我在征求作者同意后，将此10万字的专题一拆为二。其第一部分，构成了我们开卷便能阅读到的一幅东北少数民族萨满音乐文化历史与现状的画卷。在这幅总论性的画卷后，分别由蒙古族（3篇）；满族（2篇）；鄂伦春（1篇）共6篇分述构成本卷本的第二部分。而第三部分，再由刘桂腾的《萨满鼓专论》构成。

刘桂腾的研究，反映出他几十年来在本领域的耕耘成果。其由点到面、执微观和宏观两端步步深入的研究，不仅成为中国萨满音乐文化研究的一面旗帜，也伴随着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探索足迹。他不仅在国际语境中对萨满鼓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也是目前在萨满音乐研究中对东北各少数民族萨满祭祀涉猎最广的学者。他的论文以黑龙江、辽河以及鸭绿江流域为地域文化框架，面对“三江”流域存见的萨满鼓，结合历史文献钩沉，通过自然人文环境、萨满祭祀风俗与萨满鼓形制特征形成关系的考察，力图廓清不同类型萨满鼓流布的区域和基本情况，并映射出萨满音乐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历史变迁。

本书有关满族萨满的个案研究，收录了吕晓东的《宁安瓜尔佳哈拉萨满仪式音乐考察》和王晓东《九台满族锡克特里哈拉萨满仪式音乐考察》两例。关于宁安和九台的满族萨满祭祀的考察报告，音乐学界之外曾有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以及文学界的学者进行过不同形式的讨论。本书收录的这两个个案型的考察报告，其主要特点在于“音乐民族志”。其内容不仅包括了一般地理历史文化、满族萨满祭祀的类型概述，更重要的是对祭祀仪式的田野实录以及其音乐特征、使用乐器形制的详细记录与描写。此外，两个个案，都分别就萨满仪式音乐的传承方式、传承谱系和仪式音乐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为我们留下了研究满族萨满仪式音乐在特定时空的珍贵标本。两份个案，同以满族萨满祭祀音乐为对象，因此在相关祭祀类型和神祇等方面，有所交叠。为了保证“个案”的完整性，编者未作删节，这样做的目的着眼于为今后族群内部因不同地域和氏族的萨满祭祀音乐的比较研究提供参照。

三篇蒙古族萨满音乐研究论文分别来自三位蒙古族学者。其中两篇为科尔沁萨满仪式音乐，一篇为巴尔虎萨满仪式音乐的讨论。在研究者身份上，兼具了学者和相对于族属来说的“局内人”身份，也反映了少数民族学者在近年的成长。其中杨玉成的《蒙古族科尔沁萨满仪式的象征及其音声》是一篇注

重从象征符号的视角来讨论科尔沁萨满音乐文化的力作。这篇论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从蒙古族的历史文化出发，对科尔沁地方传统中的萨满仪式音乐进行了概述，提出科尔沁萨满文化的表层符号系统及其行为表达以及深层的信仰层面，无不渗透了地方历史中不同文化（如佛教、汉文化）等的影响。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了蒙古族萨满的神职系统和神灵世界。作者充分利用了语言上的优势，在称谓、职能等方面的描写和分析，为我们展示出一个萨满、神灵、人所构成的世界关系图景。第四部分转轮蒙古族萨满的象征体系，其中包括有形符号和无形符号，而仪式音声在此分类中属于无形符号的系统。而第五部分，则就仪式音声这一无形符号展开重点的论述，从音乐和非音乐、不同类型的音声组合关系以及表演程式入手，深入讨论了萨满仪式音声在“信仰—仪式”关系中，如何“用音声导入仪式，通过音声来组织仪式，通过音声将人间与神界连接起来，通过音声来解决人之事”的运用和功能。如果说杨玉成的论文是基于田野资料，以象征符号理论对蒙古族萨满音乐文化的归纳；由文慧撰写的《科尔沁萨满仪式及其音乐的分析》，则为聚焦仪式个案的音乐民族志文本。该文本以居住在科尔沁左翼中旗架马吐镇的“渥都干”（女性萨满）所举行的两场仪式为描述和分析对象。其一为供奉吉雅奇仪式^①，其二为供奉希图根仪式^②。作者希望通过两个仪式中的共同特点比较，来分析其仪式模式。这一问题意识，是希望通过分析，找到科尔沁萨满在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既有关于仪式理想结构的“模式”，又有着每一次仪式中所表现的外显形态，从而在观念与实践、思想与行为、音声的结构模式和仪式展演之间，考察其动态的运用，进而强调了仪式符号要在仪式语境中才能具有的意义和功能。

另外一篇蒙古族萨满音乐的研究，是由红梅完成的。她以呼伦贝尔蒙古博“希图根·塔嘿乎”仪式个案为例，讨论了蒙古博教祭祀仪式与敖包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自古以来，蒙古族敖包祭祀与蒙古博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敖包祭祀的历史发展进程与蒙古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相同步，反映着整个蒙古民

^① 吉雅奇是游牧封建社会科尔沁部蒙古人所共同尊奉的五畜守护神。

^② 希图根即每一个萨满个体所有的守护神或护佑神。

族游牧文化生活的传承与变迁，它既是宗教信仰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民族风俗、传统和文化的特殊展现。”而通过深入的田野考察，作者发现在蒙古博教祭祀仪式音乐中，敖包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巴尔虎蒙古博的请神曲中多次出现“通过‘安本·敖包’接受神灵的庇佑”等唱词。博教中的各路神灵是通过敖包找到自己的故土，从而完成庇佑故乡的子孙后代的任务。请神必要从“敖包翁古召唤调”（obogan nu ongo dagudalga）开始行博。将蒙古族博教祭祀仪式音乐置于敖包祭祀这一个文化语境中，重新审视敖包与蒙古博教信仰之间的深层关系，对于系统研究蒙古族传统音乐、探寻其根基和发展脉络，研究蒙古族敖包祭祀音乐的文化变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该论文不仅提供了丰满的仪式实录，并且在仪式与音声关系的描写与分析中，特别注重仪式与仪式音声之间的关系，并以“同形同构”的分析，指出这一特点是巴尔虎蒙古博教信仰体系中“希图根·塔嘿乎”仪式音乐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当下想要以“信仰-仪式-音声”三合一的“活态”背景中研究鄂伦春的萨满仪式音声，存在一些客观障碍。比如，鄂伦春族目前健在的萨满仅有关扣尼老人一位，且年事已高。所以，要获得完整的仪式个案民族志，几乎不可能。因此，高贺杰在其《音声视角下的萨满服研究》一文中，以前人的研究梳理为基础，将视角聚焦于“什么是‘萨满音声’以及它又是如何表现的”问题上。作者认为，除了萨满歌唱以及各种响器分门别类的研究外，其音声的真正体现，其实借助于萨满（有时也包括其助手及整个信仰群体）在仪式过程中的整体活动而得以体现。这个“整体活动”除了我们习惯谓之的音乐活动外，如歌唱即敲击萨满鼓等外，还有一点就是萨满的身体运动。因此，萨满仪式中的各种响器，如腰铃、铜镜等等，它们“得以凝聚和衔接的中介，恰恰是萨满神性身体的外在体现——萨满服”。所以，作者将萨满服本身视为一件乐器，并从“多与少——音声的级序”以及“轻与重——音声的能量”等方面，探讨它在萨满仪式音声整体中具有的结构意义。作者的观点，其实不独为鄂伦春的萨满音声研究所独具，也不仅仅可以放在整体的萨满音声研究中来看。以服饰缀满响器的记载，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圣经·出埃及记》中就有关于祭祀的“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作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石

榴”等记载。就此，弗雷泽在《〈旧约〉的民俗》中亦引证和分析了相关的跨文化资料。而作为东北各族群的萨满服及其音声的研究，我们还是必须有民族志入手，通过不同服饰响器的制度性缀饰及其在仪式中经由“身体活动”所体现的内涵来深入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是东北少数民族中萨满音乐文化研究的专卷，因此涉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各种称谓，不同的作者“汉译”不同。比如蒙古族萨满有音译为“孛额”（杨玉成、文慧），也有音译为“博”（红梅）。编者未将其统一，而是保留作者的原译。希望读者能够在阅读时，根据发音自行判断。

当然，编完这本“东北卷”，以地域卷本为单元的“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计划暂告一个段落，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束。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仍然希望与本领域学者们携手开拓，继续以扎实的田野音乐民族志，加深对中国仪式音乐传统的认知。

参考文献：

1. 曹本冶主编：《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西南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 曹本冶主编：《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西北卷》，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
3. 曹本冶主编：《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东卷》（上、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4. 曹本冶主编：《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南卷》（上、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5. 曹本冶主编：《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北、西南、华东增补合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
6. 刘红主编：《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中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

目 录

- 东北少数民族萨满仪式音乐 / 刘桂腾 …… 1
- 蒙古族科尔沁萨满仪式的象征及其音声 / 杨玉成 …… 53
- 蒙古博教祭祀仪式与敖包的关系研究
——以呼伦贝尔蒙古博“希图根·塔嘿乎”仪式为个案 / 红 梅 …… 119
- 科尔沁萨满仪式及其音乐的分析 / 文 慧 …… 174
- 九台满族锡克特里哈拉萨满仪式音乐考察 / 王晓东 …… 220
- 宁安瓜尔佳哈拉萨满仪式音乐考察 / 吕晓东 …… 256
- 音声视角下的萨满服研究
——以两次鄂伦春萨满仪式音声个案为例 / 高贺杰 …… 323
- 萨满鼓专论 / 刘桂腾 …… 359

东北少数民族萨满仪式音乐

刘桂腾

东北地区的黑龙江、辽河和鸭绿江流域，是中国萨满文化的三大重点区域。

流域，是传统社会在渔猎、游牧和农耕经济条件下族群迁徙、聚居的自然流向。人与自然因素的结合，创造了特定地理、物候环境为基础的流域文明；因而，流域也是一种传统文化载体。考察结果表明，萨满鼓的流传路向，往往与这些渔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迁徙规律密切相关。这样，特定流域就成为我们整体观照萨满音乐文化的一个有效的学术视野。由行政区划割裂的音乐文化空间，在特定流域中显现出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同时，也使相互之间由地理因素所构成的渊源关系也得以合理的揭示。我国东北地区萨满信众集中，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均有萨满信仰。尽管民族间的文化个性有别，但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和文化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必然反映在一定流域的萨满文化现象之中。

一、自然环境

黑龙江、辽河、鸭绿江流域中的大兴安岭山地、三江平原、松嫩平原、辽河平原、河谷平原低地和呼伦贝尔高原等构成了东北地理的基本面貌。

三江平原^①，又称三江低地，即东北平原东北部，中国最大的沼泽分布区。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这三条大江汇流、冲积成了这块肥沃的北大仓。区域内水资源非常丰富，总量 187.64 亿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大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5 倍，在低山丘陵地带还分布有 252 万公顷的针阔混交林。

松嫩平原，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南以松辽分水岭为界，北与小兴安岭山脉相连，东西两面分别与东部山地和大兴安岭接壤。整个平原略呈菱形。松嫩平原与辽河平原由松花江、辽河的分水岭隔开，又合称为松辽平原，是东北平原的主体。黑龙江省境内面积为 10.32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 21.61%。松嫩平原在地质构造上是一个凹陷地区，属于松辽断陷带的一部分。凹陷区的西南部现在还在继续下沉，东北部则有上升现象。第三纪和第四纪的沉积物已上升为台地（当地称之为岗）。平原表面海拔 120—300 米，中部分布着众多的湿地和大小湖泊，地势比较低平，嫩江与松花江流经西部和南部，漫滩宽广。平原的西南部为闭流区，由无尾河形成。嫩江东岸，富裕到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一带有砂丘分布。

辽河平原，辽河下游平原地区位于辽宁东部丘陵与辽宁西部丘陵之间，铁岭至彰武之南，直至辽东湾为一长期沉降区。地势低平，海拔一般在 50 米以下，沈阳以北较高，辽河三角洲近海部分仅 2—10 米，有辽河、太子河、浑河、大凌河、小凌河、沙河等。各河中下游比降小，水流缓慢，多河曲和沙洲，港汊纵横，堆积旺盛，河床不断抬高，导致河水宣泄不畅。滨海的盘锦地区方圆 5000 平方千米范围内为沼泽盐碱地，历史上经常发生水灾，有东北“南大荒”之称。经过不断治理，现已成为东北水稻的重要产区。辽河平原矿产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有全国第四大油田“辽河油田”。

呼伦贝尔高原，又称巴尔虎高原。位于内蒙古高原东北部，大兴安岭北段西麓。地势东高西低，平坦开阔，东与大兴安岭山地连成一片，西部属低山丘陵地带，中部为波状起伏的海拉尔台地高原。海拔一般在 600—800 米之间，最高的巴彦山海拔 1038 米，呼伦湖附近最低，为 540 米。地表水系发育，水

^① 三江平原的“三江”，即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

资源比较丰富，植被以羊草和针茅为主的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是我国最好的天然草牧场。高原上有呼伦湖、贝尔湖和其他中小湖池 500 多个，盛产鱼类，湖滨四周滩地生长有盐生草甸植被。高原上的河流大都流向西北，形成黑龙江上游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水系与呼伦湖水系。高原上有 3 条较大沙带和零星沙丘堆积。

大兴安岭山地，北起黑龙江、鄂尔古纳河，南止西拉木伦河，东接小兴安岭，南邻科尔沁草原、松辽和松嫩平原。呈北北东—南南西走向的大兴安岭，长约 1400 公里，海拔在 500—1500 米。呼伦贝尔市境内的大兴安岭山脉长约 700 公里，宽约 200—450 公里，其面积占大兴安岭山脉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其山势纵长横短，北宽南窄；岭西地势高而平缓，岭东地势低而稍陡；是呼伦贝尔高原与松嫩平原的天然分界线，也是鄂尔古纳河与嫩江的分水岭。

呼伦贝尔高原，位于大兴安岭西侧。东与东南为中低山丘陵地带，中部为波状起伏的海拉尔台地高原，向西南方一直延伸到呼伦湖东岸，是构成呼伦贝尔高原的主体，也是蒙古高原的东北部边缘。海拉尔河以北的地势东高西低，为波状起伏的大草原；从最低处的呼伦湖附近越向东越高，逐渐与大兴安岭连成一片。西部属低山丘陵地带，在中蒙毗邻的地区与蒙古高原相连。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呼伦贝尔，是亚洲中部蒙古高原的组成部分。大兴安岭纵贯呼伦贝尔市中部，北段山地泰加林区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山脊的两侧，西麓缓坡有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东麓低地有宽坦的嫩江西岸河谷平原。

河谷平原有嫩江西岸河谷平原和鄂尔古纳河上游河谷平原。嫩江平原，为一沿山体延伸的丘陵、谷地和带状平原，位于大兴安岭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地带，西自大兴安岭分水岭呈阶梯状从中山、低山、丘陵下降至松辽平原的西部边缘。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倾斜，靠近大兴安岭东部有丘陵分布。低山地区河谷与丘陵交错，河流众多，河谷阶地宽坦。鄂尔古纳河上游河谷平原，地势开阔。上连海拉尔河下游低地，下接三河下游的大片沼泽低地，沼泽遍地，牧草繁盛。

从植被特征上看，地域广大的呼伦贝尔市最具典型性。由东向西的大兴安岭森林草原区、山地泰加林（亦称北方森林）区、呼伦贝尔草原区，三个较大的不同植被区域，形成了呼伦贝尔市的植物区系。大兴安岭东麓森林草原

区，呈森林向草原的过渡型：森林草原地区的草甸草原的草本植物替代了森林的木本植物，位于鄂伦春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荣旗等境内。山地泰加林区，是大兴安岭植物区系的主体，山脊的东西两侧逐渐过渡到森林草原和草甸草原地带，大多分布于大兴安岭北段的根河市和南段的牙克石市境内。大兴安岭以西的呼伦贝尔草原区，地跨森林草原、草甸草原和干旱草原三个地带，除了东部地区有少量森林覆盖外，大多为天然牧场，位于鄂温克族自治旗、新巴尔虎旗、陈巴尔虎旗等境内。

二、人文史略

自西汉以降，秽貊、扶余、勿吉、肃慎、靺鞨人等形成了东胡、肃慎、扶余三大古代族群。这些族群，构成了黑龙江流域古代绵延不绝的民族谱系，并相继建立了具有强势统治力的地方政权和渔猎、游牧、农耕经济社会，黑龙江流域成为中国北方文明的肇兴之地；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人建立的北魏、辽、金、元、清王朝，则对1600年以来的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史产生了深远影响。^①

居于中国东北大地的现代少数民族，主要是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满族、赫哲族、锡伯族以及蒙古语族的蒙古族、达斡尔族诸民族。民族史研究表明，东北地区的现代少数民族与古代民族并不完全等同。由于生产、战争、迁徙的缘故，形成了“大分散，小聚集”的社会结构和深刻打上自然环境烙印的地域文化特征。东北诸民族相互之间存在共同族源，历史上的分分合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些族群普遍具有以“万物有灵观”为哲学基础的萨满信仰，成为东北少数民族民族发展史中的精神家园。

东北地区具有萨满信仰的少数民族，主要是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诸民族。

^① 拓跋鲜卑、契丹人起源于黑龙江流域嫩江水系，蒙古人起源于黑龙江流域额尔古纳河水系，女真、满洲人起源于黑龙江流域松花江水系。

（一）满—通古斯语族

1. 满族

满族，20世纪90年代有人口9821 18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90年^①），辽宁、河北居住最多，其余散居在吉林、黑龙江、内蒙、新疆、甘肃、宁夏、山东等省（区）以及北京、成都、西安、广州等市。1985年后，相继成立凤城、新宾、岫岩、清原、北镇、桓仁、宽甸、青龙、丰宁、围场、宽城、伊通等满族自治县，近400个满族乡。

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清入关后，中原满族人受周围文化环境影响逐渐习汉语，东北则有大量汉人出关，渐使满族人也习汉语。至今，只有黑龙江省边远地区少数老年人会讲满语，其他地区满族人已全部通用汉语、汉文。现代满族人民以农业生产为主，兼从事养殖、采集，居城市者从事工业、商业、教育、医疗、艺术等工作。

作为我国北方古老的渔猎民族，满族的先世，先秦之肃慎，秦汉之挹娄，魏晋南北朝之勿吉，隋唐之靺鞨，到10世纪前辽灭渤海时已经以女真之名见称于世，明代女真为其直系先祖。后金天聪九年（1635），爱新觉罗皇太极正式改“诸申”（女真）为满洲，1911年辛亥革命后简称满族。历史上，先后有以粟末靺鞨为主体的渤海政权（698—926）、以黑水靺鞨为中心的金政权（1115—1234）、女真人的后金政权（1616—1636），几度统辖过整个东北广大地区。女真人自明初以来逐渐南迁。建州女真各部迁至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北麓，南至鸭绿江边。海西女真南迁后，分布于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大拐弯处。建州、海西女真各部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较为先进。东海女真（野人女真）散处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大体上以松花江中游以下，迄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东达海岸。其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各部落间极不平衡。建州左卫的首领努尔哈赤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起，经过30余年的兼并战争，将东达海滨、西达开原、北抵嫩江、南至鸭绿江分散的女真各部统一起来。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至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

皇太极改诸申为满洲时，我国东北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终于在1644年入关定鼎中原，进而统治了全中国。

2. 赫哲族

赫哲族，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口4 245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90年），是东北萨满信仰诸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赫哲族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同江市、饶河县、抚远县，少数人散居于桦川、依兰、富锦三县的一些村镇和佳木斯市市郊等地。因分布地区不同，从而有不同的自称。居富锦县大屯沿松花江上游的称“那贝”，居嘎尔当屯至街律口村的称“那乃”，居勤得利村沿黑龙江下游至乌苏里江的称“那尼傲”。赫哲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赫哲族无文字，通用汉语文。

赫哲族的祖先，自古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繁衍生息。属于肃慎系统的挹娄、勿吉、黑水靺鞨、野人女真等古代民族，与赫哲族的祖先有渊源关系。至清初，赫哲族始以“黑斤”、“黑真”、“赫真”、“奇楞”、“赫哲”等名称见于文献。清代按牛录编入旗籍的赫哲人称“伊彻满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族名统一为赫哲。一般认为赫哲族是以古老的赫哲族氏族为核心，吸收了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满族等民族成分和原属黑龙江流域其他土著，以及来到赫哲族分布区居住的蒙古人、汉人等成分，在清初形成了较稳定的族体，主要从事渔猎生产，其社会发展尚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阶段。

顺治元年（1644），清世祖入山海关前后，曾相继将赫哲族编户收贡，编旗披甲。直到19世纪初叶，由牡丹江至黑龙江下游乌扎拉村，所有赫哲族的22个氏族，都由清廷按其氏族与分布地区行使有效的管辖。在清代，赫哲族与内地及当地各民族的产品交换关系日益发展，赫哲族渔猎的工具也逐渐有所改进，生产力逐渐提高，原始社会逐渐分解，至清末已从原始社会末期跨入阶级社会。辛亥革命后，三江平原开发的速度加快，赫哲族与汉族杂居，渔猎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加深，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与汉族及周围其他各族不可分割的联系。

渔猎经济为赫哲族生活的主要来源，夏捕鱼作粉，冬捕貂易货以为生

计。17世纪末，由以物易物转向猪产品大量商品化。20世纪初，猎业衰退，渔业产品大量商品化。赫哲族男女衣服皆用鹿皮和鱼皮制作，足穿鱼皮及狍、鹿腿皮做的靴鞅，内絮靴鞅草。过去妇女的衣服多缘以色布，边缀铜铃，与铠甲相似。20世纪初，大部分人以棉布为衣，辅之以鱼、兽皮衣。赫哲族人民日常吃鲜鱼、兽肉，加工各种鱼、兽肉干，备常年食用。住宅为用桦皮、兽皮、茅草搭成的“撮罗子”（尖顶）、“胡如布”（圆顶）及各种“昂库”（棚子）。夏季构木而居，冬则凿地为“地窖子”，有穴居的遗风。较普遍地住泥墙草顶房屋。冬踏滑雪板或役犬挽雪橇以为交通，夏季以桦皮船、舢板从事运输和捕鱼。由于战乱、疾病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的影响，赫哲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的人口仅有500余人，70年代达到1000余人，80年代达到1498人，90年代据全国人口普查达到4245人，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

3. 锡伯族

锡伯族有人口172 847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90年），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和西北地区的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以及霍城、巩留和塔城地区、伊宁、乌鲁木齐等地。东北地区的锡伯族通用汉语文和蒙古语文；居住在新疆的锡伯族使用锡伯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兼通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其文字为由满文改革而来的锡伯文。

“锡伯”为本族自称。汉文则有犀毗、师比、鲜卑、矢比、席百、席比、锡伯等不同译音和写法。关于锡伯一词的含义，诸说不一，一说为瑞兽或带钩，即《汉书·匈奴传》所称“犀毗”，一说为地名。清代将海拉尔以南室韦山一带，注称为锡伯，居住在这一带的人因以得名；本民族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是鲜卑遗民，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

锡伯族与古代鲜卑有渊源关系。最初游牧在大兴安岭东麓，至十六国时（303—439），慕容等部南迁至黄河流域并建立了政权，后融于汉族。少数鲜卑人仍居住在嫩江、绰尔河、松花江一带，保持了原有的生产方式。这部分鲜卑人就是今日锡伯族的先民。也有说锡伯族来源于匈奴，或室韦，或女真。清